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五三八）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〇六期 ——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906c)

【研究动态】	当代知青专题研究述评	张穗强·陈武俊
【童年旧事】	不愿想起，不能忘记	方 非
【劫后反思】	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陆小宝
【书刊评论】	一代青年精英的文革思想史——读印红标著《失踪者的足迹》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	何 蜀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研究动态】

当代知青专题研究述评

· 张穗强·陈武俊 ·

2008 年是全国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 40 周年的日子，对一代知青群体来说，1968 年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上山下乡运动更值得回顾、总结和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文革中形成高潮，到七十年代末结束，前后经历了近三十年。其中以 1968——1978 这十年的岁月最具代表性和复杂性，已成为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知青回城至今已经 30 年了。这 30 年间，中国的社会形态和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此间知青问题的研究、反思和评价工作也一直没停顿过，越来越多的论著和作品问世，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加入知青研究之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少知青研究者在知青专题研究的园地辛勤耕耘，提出许多真知灼见，为社会留下启示，也给人们留下反思。综观过去三十年来海内外对知青问题的研究成果，笔者谨对部分专题及相关论点作一简单述评，并提出一些不成熟看法。

一、关于上山下乡背景、根源及历史地位的研究

现时已公开发表的著作和作品中，包括一些极具知名度和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相当部分是讨论上山下乡这一特定历史事情的背景、根源和历史地位这一专题的。事实上，上山下乡是知青群体存在和发展的土壤，研究知青问题首先触及到的，是怎样评价上山下乡。其实，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国外就有学者研究和评价中国的上山下乡问题。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1977年出版的论著《上山下乡》。该书直至1993年才有中文译本在国内出版。中国著名知青问题研究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小萌、顾洪章曾专门撰文介绍和评价，认为此作是不带任何政治偏见，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目的、政策、过程、结果、以及对这场运动的政治色彩、社会冲突、价值观念及社会地位，都作了精辟的分析和研究，认为它是迄今为止国外研究中国知青上山下乡问题最全面、最详细、最具影响力的著作。站在今天的立场与角度看，笔者认为，该书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固然值得商榷，但它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框架，对后来国内的同类研究专著，有很大的启示和帮助。另一方面，该书以大量的数据和政策文件为据，指出上山下乡的经济原因，是“教育与社会经济协调的危机”，明显看出作者侧重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研究上山下乡的立场，尽管此举在国内曾受到一些非议，但从学术角度来看，这观点仍不失为评价上山下乡运动的一大见解。1987年张化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从历史进程角度评价上山下乡。该文认为文革前后的上山下乡属性质完全不同范畴。文革前的知青运动有一定的经济需求因素，在当时情况下确有一定的安置就业成分，但也已带有相当的政治鼓动色彩。而文革后的上山下乡，则已完全成为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应予彻底否定。张化的上述观点，在内地受到相当广泛的认同，该文对内地有关上山下乡历史地位的评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应是现今较为主流的研究观点。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有关上山下乡地位的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多部有分量的专著问世。其中较有影响的包括：九十年代末由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两部专著中的作者不少是原来中央知青办成员，占有官方历史资料及中央决策过程的权威性，对上山下乡地位研究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但总体而言，这两书的不少观点和立场代表了官方对上山下乡的看法，未必能为广大知青所接受，有相当的局限性。

此外，这段时间问世的书籍还有：曹淳亮主编的《知青故事》；孔慧云主编的《知青生活回忆》；王大闻主编的《客树回望成故乡》；信群主编的《岁月留痕》、《无悔年华》；胡发云等主编的《沧桑人生》；木斋的《恍若隔世》；沈殿忠的《思想沉浮录》；王鸣剑的《上山下乡：一场决定3000万中国人命运的运动之谜》；王曾如、李向东的《上山下乡：中国1968》；萧复兴的《绝唱：老三届》；晓剑、郭小东的《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等。

综观现时海内外对上山下乡背景、根源及历史地位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它已形成如下四方面特点：

（一）大量的上山下乡历史资料和进程性事件已成功整理出来，并形成了较为系统性、阶段性和综合性的研究成果，为客观总结、研究和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研究知青问题的基本理论初步形成，形成了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研究的基本结局。

（三）以当年上山下乡知青为主力的学术研究队伍初步形成，并得到了官方基本认可，获得了相当翔实的第一手上山下乡纪实性资料，取的初步的研究成果。

（四）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的地位未能形成统一、客观、科学的评价，各方面的争议性相当大，相当一部分观点未能得到学术界的论证和认可，也未能得到知青群体的普遍接受。

二、关于知青运动内涵及社会影响的研究

海内外迄今为止问世并出版的知青著作集作品中，占数目最多的是讨论知青精神。但何谓“知青精神”，却未有统一、规范、完整的研究结论。笔者注意到，在既往研究知青精神的文章及作品中，相当多是结合“老三届”这一特定的群体来展开，显示“知青精神”的研究背景，主要是针对1968—1978这十年时间（因为老三届正是这段时间出现的产物）。这一方面，最早出现及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1986年崔武年、阎淮写的《谈谈老三届》一文。该文从研究老三届这代人产生的历史背景、教育状况、思想意识、行为风采等层面着手，收集了相当充实的资料和数据，剖析知青/老三届这一群体的时代特征，从而带出“知青精神”的内涵。虽然该文并未最后对“知青精神”作完整、准确的论证，但却明确指出：“知青精神源于这代人自觉负起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并点出“研究知青精神实质，在于研究经过上山下乡磨难、反思和奉献的一代人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内地较全面、深入和客观论证“知青精神”的学术观点。但该文过于褒扬、宣传性的官方文章色彩，也在学术界和知青群体中引来一些非议。但总体而言，它仍不失为现时研究“知青精神”最有影响的成果之一。

值得指出的是，现时公开发表的有关研究知青精神及社会影响的成果，数量最多的却是纪实性、回顾性的回忆录作品。较有影响的成果包括：肖复兴、肖复华的《啊，老三届》（1988）；白描的《苍凉青春》（1989）；以及《知青沉浮录》、《红土热血》、《蹉跎与崛起》、《光荣与梦想》、《热血冷泪》、《知青档案》、《命运列车》等。而这段时间出版的，还有一些较有影响的知青纪实性文学作品，包括：《北大荒风云录》、《中国知青部落》、《草原启示录》、《悲怆青春》、《中国知青悲欢录》等。然而，笔者认为，这些纪实性的回忆录和纪实性文学作品在评价知青运动及其社会影响方面，仍有较大的分歧，总体而言，大致形成了三方面的不同看法：

看法一：上山下乡是建国后就陆续形成的，带有安置、戍边、调节城乡劳动力目的运动，它凝聚了几代人建设国家，献身边疆的壮举。尽管它在1968年后伴随“最高指示”的发表而卷入了文化大革命中，带有“惩罚性”色彩，但从整体上看，在中国当时特定环境下，上山下乡运动是城乡落后面貌产物，是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必然，知青精神的主流是“青春无悔”，知青精神即“奉献”精神，应予充分肯定。

看法二：上山下乡从主体上是错误的，悲剧性的，是中国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革命的产物。它荒废了人才，破坏了生产力，甚至摧残了人性，严重扭曲思想，造成社会动荡，是逆社会发展潮流的，应予彻底否定。持上述观点的成果对上山下乡和知青运动立足于反思、否定和批判。这类作品与前一类作品很明显是对立的，持完全不同立场的。

看法三：第三种观点介于上述两者之间，一方面认为上山下乡练就了一代知青群体的坚韧精神，塑造了一种时代动力，甚至形成了新思维、新文化。另一方面，又认为上山下乡为知青带来了巨大不幸，形成了弱势群体，酿造了家庭悲剧，留下沉重的社会包袱和历史灾难，有待社会予以补偿。

三、关于知青史和知青辞典方面的研究

在当代知青问题的研究中，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知青史及知青辞典研究较为学术化，是知青专题研究的重大成果。1996年“青运所”北京举办的“知青与社会转型”研讨会，首次提出“知青问题研究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课题，须从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以及相关学科出发进行综合性研究。”在1998年“青运所”与《中国青年研究》杂志社主办的“知青上山下乡30年”笔会上，更提出“知青研究要学术化、系统化”，还提出要“多学科、多角度拓宽研究领域，调换研究角度”的要求，标志着知青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逐步形成专业化、学术化的研究风格。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内地曾先后出版了30多部有关知青研究的专著，学术性、专业性明显提高。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著作，包括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的初澜》（1953—1968）、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以及他们俩合编的《中国知青事典》。两部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专著，均以历史发展的研究方式，分别介绍、分析、总结文革前后知青上山下乡的不同背景和历史地位；均用大量、翔实的史料和数据，从理论上深入讨论了上山下乡的过程、问题和影响，不少更是鲜为人知的史实和资料，并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新看法，与以往的知青研究成果相比，其在系统性、时间性、推断性方面明显增强，堪称知青史研究方面的佼佼者。

刘小萌、定宜庄1995年主编的《中国知青事典》，则是迄今为止首部以辞典、史实形式研究知青问题的专著，其学术性、理论性也相当高。该书大量摘录了知青上山下乡过程中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主要研究成果、以及主要的观点和看法，并包括了编者的分析评论，可说是研究知青问题的“辞海”，对知青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有重大参考价值。在《中国知青史》和《中国知青事典》的基础上，1998年还出版了一套《中国知青总记》专著，全著共三卷七篇，长达2700页。该书虽然内容主要转载、摘录《中国知青史》、《中国知青事典》两书，以及相关的知青回忆录、知青书信、知青诗抄等。该书最大特点，是按时间顺序和专题内容，分类详尽记录了上山下乡运动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件、文件、电影、小说、诗歌、歌曲等，是研究知青问题难得的资料性汇总类成果。

另一部值得肯定的知青学术专著，是金大陆1994年出版的《苦难与风流》及1998年出版的《世运与命运》，这两部专著的特点是采用现代统计学的研究方法，在广泛进行问卷调查及访谈基础上，针对现时知青群体的基本状况、经济环境、政治立场、人生态度、业余生活、价值观取向，以及与当代社会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收集了大量数据，并作深入、广泛的研究分析。这是内地首部对知青/老三届现状所做的系统性、动态性研究成果，对知青运动及上山下乡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行深层的反思，是知青问题研究中实证调查与统计相结合的成功典范，为知青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

四、关于知青题材影视作品的探索性研究

在知青问题研究的众多成果，笔者注意到，近二十年来，内地有大批对知青问题进行研究、探索的影视作品问世，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这些包括电影、电视连续剧、纪实片在内的知青题材影视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编导者在创作、拍摄的过程中，紧密结合当今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相关现象和潮流，对知青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探讨，形成了一批探索性较强，在社会及观众中具影响力的知青影视作品。这些作品的人物和情节虽然都是编导创作出来的，但由于影视观赏在民众中的普及性，使知青问题在社会上产生了新的共鸣，为民众带来了新的思考，形成新的感染力。故笔者认为，这类具探索性的知青题材影视作品，也是知青问题的研究成果，而且是具独特影响力的重要成果，值得引起重视。

据不完全统计，近二十年来问世的知青影视作品达上百部之多，较有代表性的包括《蹉跎岁月》、《孽债》、《他们无处安放青春》、《天浴》、《中国知青部落》、《血色浪漫》、《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等。内地这些反映知青题材的影视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在原同名小说的基础上改编的，而这些小说往往在出版时就已在社会及知青群体中引起强烈反响。如叶辛创作的反映上海知青下乡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电视剧《孽债》，播出后曾在上海知青中引起轰动。它描写下乡期间一些知青曾与当地乡民结婚育子，为回城被迫离婚弃儿，这些孩子长大后，来到上海寻找亲生父母过程中所面对的种种坎坷，探讨在上山下乡及回城就业的历史性潮流中，知青的婚姻、家庭、子女问题的为一代人带来刻骨铭心的人生悲剧和心灵创伤，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也留下广阔的思考和研究空间。后来，在观众和知青群体的强烈期盼和要求下，作者又创作了《孽债》（下集），现示知青影视作品在社会的强大生命力。

又如郭小东创作的电视剧《中国知青部落》，通过描写一批知青在边疆度过的艰辛岁月，以及他们回城后经历的风风雨雨，表达出作者对上山下乡运动的鞭挞。作为知青文学研究学者的郭小东，其创作和研究一向对上山下乡持否定态度，他强调的“不能把作为人类悲剧的知青运动与人由逆境而成功的因素相提并论，从而得出知青运动也有其积极方面”的观点，在《中国知青部落》中可说得到充分体现。

电视剧《血色浪漫》通过描写几对知青 / 老三届在回城前后婚姻情感的风风雨雨，探讨知青回城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形态的急剧变迁中，知青婚姻情感的变化，及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的冲突，研究内地在对外开放的大环境下，中外文化交融对知青多元化感情世界的影响。婚姻情感历来是知青影视作品的重要内容，对进入不惑之年的知青群体来说，有关知青婚姻情感与社会文化关系的课题无疑受到高度关注，在这方面，《血色浪漫》可说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纪实片方面，2000年由晓剑、郭小东撰稿，华文影视中心、江新业文化有限公司摄制的20集大型电视纪实片《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是迄今为止最全面、广泛、多角度、多层次探讨知青问题的纪实性影视作品。该片分别从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前奏、知青到农村大迁移、知青回城后的就业；知青在升学、留洋、经商、做官、下岗等方面的出路；知青学术研究；知青婚姻家庭、知青子女教育；局外人如何看知青等多个不同侧面与层次，研究上山下乡对知青群体的深远影响。该片通过记述\座谈\走访\评论等多种方式，从多方面\多角度分析知青问题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影响，堪称“影视作品探索知青问题百科全书”。笔者认为，在当今高度资讯化、娱乐化的社会环境下，知青问题作为当代社会一个历史性、综合性的研究领域，通过影视作品（包括电视剧和纪实片）进行探索研究，是一个成功的突破，也是较能为社会大众和知青群体所接受的形式，故笔者相信，探讨性的知青影视作品未来会越来越多地问世。（全文完）

~~~~~

## 【童年旧事】

不愿想起，不能忘记

• 方 非 •

### 一、金条与书

当年，我家住的宿舍大院要拆了盖楼，于是我们搬到了一条深深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刚搬去两个多月，“文革”就开始了。一时间红色恐怖席卷京城，满耳听到的，不是“破四旧”就是“抄家”。

一天我回家，天已黑了，满胡同的树影在灯光下摇曳，走到门口，忽然发现大门两边的树影下站着两个人，吓了我一跳。我不认识她们，但一看那装束神情就知是街道上的造反派，我不明白这时候她们站在这里干什么，心中奇怪，她们也在黑影中一声不响地盯着我。我推门走了进去。

半夜时分，门被砸得山响，一群陌生人闯了进来，他们手抡着“武装带”，破门而入后一句话不说就开始又翻又砸。当时父、母都被关进单位的“牛棚”不能回家，家里只有奶奶带着

我们几个孩子，他们喝令我们站在一边低头认罪。

只听皮带抡得呼呼响，耳边一片稀里哗啦的破碎声。他们闯进来时我认出其中两人就是傍晚站在我家大门口的那两个，我想，这就是抄家了。

他们不停地在屋里乱摔乱砸，过了一会儿，有几个人趴在墙上或地上一边敲一边听。事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在找夹墙或地窖。可当时心里非常奇怪，不知他们在干什么。几个屋子都这么折腾遍了，最后有人突然喝问：

“说！你们家的金条都藏哪儿了！？ ”

这句话令我瞠目结舌，真是闻所未闻。

从进入中学争取“入团”开始，我就知道了我家的“问题”是属于“思想上、政治上”的，因为父亲是“右派”。为此，团组织找我谈过多少次话，我也“认识”过多少次，全都围绕着这方面。

可现在，他们忽然对我提到什么“金条”，问我家有没有金条。

这话我听起来简直太荒谬了，不由得脱口而出：

“我父母都是靠工资吃饭的，我家哪儿来的金条？”

有一个红卫兵小将抡着皮带喝道：

“还不老老实实交待！还敢顽抗！要不是刚刚颁布了 [十六条]，毛主席叫我们不要打人，我！我真想打人！说！金条藏哪儿了？！”

“说！你们家的秘密地窖在哪儿？”

皮带带着呼呼的风声一下一下抽在椅子上，把椅背上的漆都抽掉了。

多年后我才知道害怕：

阿弥陀佛！幸亏公布了十六条，多么伟大英明的毛主席！

阿弥陀佛！多么听话的红卫兵小将！这真是红卫兵最听毛主席的话！

正在闹着时，忽听有人在院里兴奋地喊了起来：

“快来！地窖在这儿呢！”

他们一窝蜂地冲了出去。

院里一个隐蔽角落有一间屋子，门紧紧地被一把大铁锁锁住，他们认定金条藏在这里，勒令我把门打开。我告诉他们这院子是单位宿舍，这是公家的房子，里面堆的是公家的一些杂物，我没有钥匙。他们不信，喝道：

“到现在你还不老实！你们家的金条准藏在这儿了，赶快打开！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他们嚷嚷着要砸门撬锁。这时有位邻居出来，证明我说的是事实，这间屋子是公家的，里面堆着一些建筑材料，都是公家的东西，钥匙在单位。

他们根本不听，问他是哪儿的，与我家什么关系？那位邻居说他也住在这院，与我父亲是一个单位的。还是不行，问他什么出身，于是人家正色道：

“我出身贫农，革命退伍军人，现在是单位的保卫科长。”

这样，他们才不喊了，也不再要砸那间屋子的门了。

他们又回到了屋里，在一堆破碎杂乱的东西中进一步地仔细翻腾。不一会儿，从父亲书桌的抽屉中翻出了一张集体合照，他们认出了上面的几位国家领导人。于是在一片惊愕的议论声中，我听明白他们原来对我家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既不知道我父亲姓甚名谁，也不知道他做什么工作、在哪里上班，连我们这院是单位宿舍都不知道，还以为这整个院子是我们家的。

到这时我才注意到来抄家的人，除六、七个街道上的造反派外，还有十几个穿黄军装、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其中大部份红卫兵竟然都是外地口音。

后来，他们又翻出了我母亲的日记，其中写到对于父亲被划为右派想不通，他们说是反动日记，交到母亲单位，从此我的母亲再也没有回来。

找不到金条，也没看出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时天已亮了。他们有人去打电话叫卡车。其他人没事干，开始审问我奶奶。问她什么出身。奶奶说是地主。有一个红卫兵就抡着皮带喝道：

“你这个老地主，现在蒋介石喊着要反攻大陆，你一定很高兴吧？你整天盼着他回来吧！”这又是太荒谬了！我忍不住又说：

“我奶奶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那个人抡着皮带说：

“你还敢顽抗！把她捆起来！”

于是他们用绳子把我的手从后面捆了起来。

他们还嚷嚷着要把我奶奶遣返回乡，交给贫下中农专政。一个街道上的人（后来我知道是街道主任）说：“我去给派出所打电话！”

一会儿她回来了，把那个总是抡着皮带的红卫兵叫了出去，在外面小声说了些什么，就再也没提遣反的事。

大卡车来了，他们开始往外抬东西，一箱箱一件件。

可能是那位邻居给父亲单位打了电话，单位很快来了人。他们来时，第一车东西已经拉走，正在装第二车。他们进屋来看了看说：

“这些书不能拿走，这里很多都是公家的。”意在保护这些书。

其实即使他们不说，抄家的人也不会要那些书，他们已经把书都倒在了地上，只是费劲地把放书的大书架和几个高大的玻璃书柜抬走了。

大卡车拉了三回，拉走了我家所有的东西，只剩下几张床，一张方桌，几把椅子，这些都是从父亲单位借的，上面钉着刻有单位名称的铜牌牌。还有就是一地的碎片和一大堆书。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抄家的原因。

当年我们搬来时，单单是书，就用了两大卡车，一个个大木箱，沉甸甸地往下抬，这情景不知被街道上什么人看在眼里，记在心头，认准了那里是金条！所以“文革”一开始，街道上的造反派就找来了一帮红卫兵（其中大部份是来京串联的），到我们家抄家找金条。

但有意思的是，最后他们拉走了我家所有的东西，包括那些大书架和玻璃大书柜，唯独忽略了那些曾使他们认为是金条的书。说起来，那里面还真有些值钱的版本和一些值钱的字画呢。后来父亲单位的人把这些都拿走了，“文革”后期，国家作价买了去。

后来，开始退还抄家财物，还成立了一个办公室，那时我早已去农村插队。那年回家探亲时，我找到了那个办公室，并不指望要回什么东西，只是希望能得到正名。人家翻了半天，最后说抄家名单上没有你家，说凡是咱们抄过的这里都有纪录，拿走的财物也都有登记，于是让我看一个大表格，密密麻麻的。

于是我才弄清楚，街道办事处，是政府最低一级的行政机构；而街道居委会，只是群众性的组织。那次抄我家的是街道居委会的人，我又跑到居委会去问。当年参与抄家的人都说这事不是她们负责，是某某校的红卫兵。我又到那学校去问，说都去农村插队了。至于来京串联的那些红卫兵，就更无法找了。

我再跑到退还财物办公室，得到的最后答复是：这是群众运动，要保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对这事我们应该理解。

于是，我对这次抄家的最后理解就是：抄了就抄了吧，你就当它没发生过。

## 二、历史、虚构与现实

第一次看《红楼梦》，还在读初中。宝、黛、钗之间的事，看得糊里糊涂。贾府被抄家一节，却有印象，觉得很可怕，贾府的人很不幸。

“文革”后再看，自己有了被抄家的经验，越看越觉得贾府的人还算不上不幸。

当抄家的公差突然闯进贾府时，他们惊得四散奔逃，同时喊着：  
“不好了，不好了，多少穿靴戴帽的强盗闯进来了！”

只这一句话，道尽了被抄人家的惊恐与惶乱，不是亲身经历，是绝对说不出的。也许这并不是小说作者的亲身经历，但那次惨痛抄家的情形，肯定是通过讲述，在家族的历史中流传，这种细节，是编不出来的。

“穿靴戴帽”是公差打扮，代表着官府权威。平时他们随便进不了贾府，即使奉命进去办什么事，也是毕恭毕敬，大步都不敢迈，更不要说进内宅了。现在他们忽然凶神恶煞地直闯内宅，而且翻箱倒柜，又砸又抢，十足的一群强盗。可是仍然穿靴戴帽，仍然代表着官府权威。所以“穿靴戴帽的强盗”，这个名字再恰当不过。

贾府的人并没有因为他们“穿靴戴帽”代表着官府，就不敢说他们是强盗，而是冲口而出，意识中没有任何阻碍地喊出了“穿靴戴帽的强盗”这样一个词组。把“穿靴戴帽”与“强盗”联在一起，这在他们以前的语境中，是绝对没有的。



说他们算不上不幸，也正在这点。做为一个人，在灾难来临的一刹那，他们能够毫不含糊地遵循着保护自己的本能：不管你是谁，只要来抢劫我的家，你就是强盗。其实，这也是为人的最低权限，连动物们都懂得保护自己的窝不受敌人侵犯，更何况人。

而我们，在熟睡的深夜里，被惊心动魄的砸门声惊醒，看着那些陌生的、戴红袖章的人气汹汹地闯进屋；看着母亲那么珍爱的花瓶、磁器被他们一个个抓起，狠狠地摔在地上；看着父亲视为至宝的胶版唱片被他们踏得粉碎；看着家被捣毁，家里最后一箱衣服被他们抬走；我们没有愤怒，没有反抗，更没有认为这是强盗行为，有的只是对这种“革命行动”的完全顺从。

当时，对一些具体的小事，我可以提出抗议，比如，家里确实没有金条，比如，奶奶确实没有欢迎蒋介石回来的意思。可是，对于他们的抄家，即使后来暴露出那么多的荒唐可疑之处，我对它的正义性仍没有丝毫的怀疑。

做为一个人，在那个时候，是什么，使我连自己的家都不敢保护？是什么，使我丧失了这种最起码的自我保护的本能？

斯大林大清洗当中，那些为苏维埃政权身经百战、出生入死、赫赫有名的开国功臣们，在法庭上当着世界各国记者的面，“坦白承认”了种种子虚乌有的“谋杀斯大林”、“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罪名，愿意接受极刑判决。这并不是严刑拷打的结果，而是他们的忠心与对领袖的崇拜使然。审讯他们的人最终使他们相信：承认自己的死罪，被判处死刑，这是革命的需要。

做为一个人，在那个时候，是什么，使他们连自己的生命都不敢保护？是什么，使他们最终相信，连自己的生命自己都无权拥有？

一群街道上的居民伙同一群中学生，仅仅因为怀疑一户人家藏有金条，另外，还因为这户人家是新搬来的“外来户”，人地生疏——这一点是当我对人性有了更深一步了解时认识到的，于是就抄了这一家。市井中种种无端的猜疑和欺生的劣根性，青少年中的幼稚无知和盲目热情，这是任何时候、包括现在，都存在着的。那么，在那个时候，是什么，使这样的一些人聚合起来，膨胀起来，野蛮地捣毁了一个与他们素不相识、无冤无仇的家庭？

日本电影《追捕》里，关在那个可怕的医院中的“病人”，曾经都是些意志坚强的杰出的人，进了那个医院就完全变了。命令他用锥子扎自己的手，他就笑嘻嘻地狠扎下去；叫他从高楼上跳下去，他就快乐地、毫不犹豫地跳下去。原来，他们是被强迫吃了一种“神经阻断”剂，他们的大脑被洗劫一空，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意识和意志，一切听命于他人。

我知道那是电影里的虚构，实际上那种药和那样的情形都是没有的。但前前后后的想了想，我又有些拿不准了，那是百分之百的虚构吗？

~~~~~

【劫后反思】

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 陆小宝 •

〔本文是作者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67届学生孙维藩的《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一书（已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写的读后感，被收入该书作为“后记”。本刊有删节。本文作

者陆小宝，男，1946年生，浙江东阳人，清华大学冶金系1965届学生，1970年毕业，分配到青海西宁，文革后调成都和广州等地工作。1993年到美国，现居纽约。——编者）

有校友把孙维藩的《清华文革写真集》的书稿从网上给我传了过来，我连夜一口气读完后，第一个感觉是：这些资料实在是太珍贵了。孙维藩是清华大学工物系1967届学生，书中所载主要是他在清华大学文革中的亲身经历，从1966年6月1日开始，几乎是逐天逐日的日记，加上200多幅清华文革各种活动的照片，还有一些当时的大字报文稿。孙维藩书中所记的那段时期，我也在清华园，其中的许多事情，我也都看到过、经历过，所以看他的书稿时感到格外真切。我在清华的年级比孙维藩低，在学校不认得他，至今也没同他见过面。通过书稿，我感到这位老学长真是有个有历史责任感的有心人，感谢他为我们那段复杂而重要的清华岁月留下了真实的记录。孙维藩书中所记的内容看起来十分普通，没有其他许多文革历史回忆中所透露的什么高层内部材料，也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场面，甚至没有什么深刻“尖端”的思想观点，它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场景中平民视角的实录；它是一个文化大革命亲身参加者对文革活动无隐无讳的原生态实录；它是当年最高学府知识分子在荒谬笼罩中对前途的真诚探索的实录。

◇ 特殊场景中的平民视角

众所周知，清华大学在文革中处在一个不同寻常的重要位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曾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幕后指使者，周恩来曾受命亲自过问清华大学的文革问题，毛泽东曾多次关注清华文革并作过具体指示。清华大学各个系中有不少高干子女，在人们眼中，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反映了中央不同派别高层领导的升迁沉降动态，以及这些派别的政治利益和政治态度。可以说，清华大学文革中一切重要事件都在中国最高层领导人的密切注视之下，有些甚至是他们亲自操纵的。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清华大学是一个最好的窥视口。仔细分析孙维藩的日记，人们可以寻踪文革中最高层各派力量之间博弈争斗的脉络。

我们看到，孙维藩在文革早期的观点变化很大，文革刚开始时他在农村四清，是忠实于党组织的学生，过几天回到学校，就批判蒋南翔是“黑帮”了；再是跟着工作组“反崩”，开始他还认为反工作组的同学是“人民内部矛盾”，很快又认识到是“敌我矛盾”了；工作组要撤了，他跳上大礼堂讲台为工作组辩护，不多久他又批判起王光美工作组来了；对刘少奇，开始认为是最尊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紧接着是犯了错误的领导人，再接着又成了坚决打倒、批深批臭的对象了；他本来是积极“反崩”的，不久，他又参加到蒯大富的井冈山去了，甚至成了井冈山机要部门的成员；再不久，他又反出井冈山，变成了四一四观点了。这样的变化，叫现在的人看起来一定觉得十分奇怪，但对当时的人来说，却是极其正常的现象。作为一个“革命群众”，每步都在“紧跟”，不是孙维藩变得快，而是高层的斗争形势变得快。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到，他前期每一次大的变化几乎都是由“首长讲话”或几篇高干子女的大字报促成的。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什么“群众运动”，实际不过是中央高层借群众声势在那里互相斗法罢了。这斗法的一招一式，有心的读者从“首长讲话”和高干子女的大字报可以看出门道。所以，孙维藩保存下来的这些原始材料十分珍贵，值得对中国文革史感兴趣的人去仔细地分析揣摩。

国内有位研究清华文革的专家，曾将这种中央和群众的特殊关系定义为“互动”。我认为，“互动”这个名词不恰当，因为它容易混淆彼此的主次责任，不能反映客观事实。还有，一些研究者常把中央文革和群众的关系描绘成“欺骗”和“受骗”的关系，有人说，发动文革的人是骗子，参加文革的人是疯子，底下群众是傻子。对于这种说法，我认为同样也不恰当。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是亿万人的运动，它的出现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是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文革初期，中央高层确有人在蓄意挑动群众，运动群众。但运动深化以后，每个人都被各自的

利益驱动着，选择他们自认为正确的言行，在充分表演。文革运动并没有按照任何人意愿的方向发展，它反映的是全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的合力。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有本事能够自始至终随心所欲地掌控文革运动的方向。

反思文革，祸害全国的主要责任者是在最高层，这是毫无疑问的。学生中的部分干部子弟，引人注目，在文革初期起过一些颇为特殊的作用，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那么，我们这些普通群众，平民子弟学生，是否就毫无责任了呢？我认为，面对历史，要有坦诚的态度。反思文化大革命的责任，我们这些亲历者不能将自己完全置于事外，高层有高层的责任，头头有头头的责任，学生群众也确实有学生群众自己这方面的责任。那时候，我们已经是二十多岁的清华大学学生，是一些有责任能力的成年人，多少还算是知识分子。怎么说“受骗”就被人家骗了呢？难道就没有自己的原因吗？

我这辈子忘不了参加批斗彭德怀时的情景，看到这位不屈的元帅双手被人强扭向后，吃力地弯着腰在台上站着，我却在台下随着大家一起呼口号。文革后四十多年，每回想起这个场面，我一直良心难安。我是农村学生，我亲眼看见了大跃进后农村大饥馑的惨状，我自己也曾被饿得半死，彭德怀为农民鼓与呼，何罪之有？他的政敌要打倒他，尚有理由可讲。我是一个农家子弟，有什么理由要跟在别人的后头起哄！事后，我憎恨自己没有勇气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放弃了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文革后，我曾经为此写过一首词叫《青玉案》，其中一句是“国内吾人应自愧”。我确实觉得自己心中有愧，我觉得全国人民都该感到有愧。作为一个平头百姓，在运动面前，我们心里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世故、懦弱、赶潮头，往往还夹杂着一些“要求进步”的投机心理，这些都不是简单用“受骗”两个字就给自己开脱得了的。其实，专制和独裁只有在大多数民众的公民责任心觉醒前才能得以存在，有时甚至是集体纵容的产物。如果我们每个中国人、每个知识分子都能担负起自己的公民责任，文化革命还会搞成这副模样吗？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再不反省，还一味抱怨说自己“受骗”，中国的将来还有希望吗？

清华大学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一个特殊场景，而孙维藩却是从一个普通平民的视角观察并记录下来的，它反映了当时绝大多数群众的实际感受。孙维藩出身普通家庭，不是高干，也不是地富反坏右。文革中，他的家庭成员和他本人基本没有受到大的冲击。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所记的内容就较少掺杂个人利益恩怨的成分，而较为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的心理和情绪。

在学校里，孙维藩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他关心国家命运，紧跟中央精神，但他没有后台，也不是极端分子，只凭着当时的形势和自己的感觉在一边随波逐流，一边积极地参加运动。他后来是四一四派的，他的战斗组叫“山里红”，也不属于发起四一四串联会的23个核心战斗组之列。孙维藩是5月29日正式宣布加入井冈山四一四总部的，而这个时候正是四一四面临最严峻考验的时刻：如果530革委会成立，搞分裂绝对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错误。像孙维藩这样的普通清华群众，文革以来一直都是紧跟中央首长讲活和高干子女动向行事的，这一次他们终于开始自我选择方向，而且是毅然抉择了具有较大政治风险的四一四一边。

说起四一四观点，现在研究文革的人似乎马上将它等同于周泉纓的“四一四思潮必胜”，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孙维藩的日记还记下他参加“反革命小丑周泉纓批判大会”呢。无可否认，周泉纓当时的某些观点，对抵制文革极左做法是有一定贡献的。但是也应看到，周泉纓的认识不能完全代表四一四群众的认识。其实，当时广大四一四派群众普遍反对周泉纓的走极端和妄图做王者师的言行。

本书所录“山里红”一批“井冈山几大怪”的文章，看起来又散又乱，毫无“理论色彩”，还有一些关于蒯大富的流言如“李琴珠怀孕之死”之类，也是似真似假。其实，这些文章和传

言都不过是发泄对蒯大富极左做法“看不过眼”和为受压制、受迫害一方“打抱不平”的情绪罢了。这种不满情绪表面看是对蒯大富的，其实很大程度上，它们是对中央文革的，是对江青等“中央首长”的。当时清华学生中，不少人对文化革命开始产生厌倦、反感和抵触，对“首长讲话”也不再步步紧跟，而是议论纷纷，虽然不会形诸笔墨公开反对（在日记上都不会），但在底下骂两声，在大字报上搞点怪，那是家常便饭。再过一段，许多人越来越失望，热情消失，大字报写得少了，连怪都懒得搞了，干脆“逍遥”，谈恋爱、焊收音机、搞“线路斗争”去了。他们虽然手在“线路斗争”，心中还是放不下“路线斗争”，不时会找人一起讨论形势，巡看学校各派的动向。现在回过头来看，四一四思潮的实质，是在广大群众中一种逐渐产生的、尚不自觉的抵制文革的思潮，而不是周泉缨那样致力于为文革寻找另一种正面理论和较好出路的思潮。从这个角度看，研究孙维藩的日记比研究周泉缨的大字报更有意义，因为它如实地反映了民心的向背。

通过日记，大家可以看到：像孙维藩这么忠厚、诚实、上进的知识分子，从紧跟中央精神、积极参加运动，到对中央精神开始玩世不恭、对运动产生反感和抵制过程，是一天天、一步步、真实地走过来的。而这个过程，只花了区区一、两年的时间。这个事实说明什么呢？它说明：文化革命运动在普通国民中，以惊人的速度耗散了共产党和革命领袖长期积累起来的权威资源；迅速解构了经过长期宣传、教育和灌输才得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正统思想框架。这个变化的速度是惊人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样特殊的政治运动，这样的变化绝对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这种变化的作用，更是惊人。如果问，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成果？可以说，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解构，这才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成果。这个成果是发动这场运动的人所始料不及的，但正是它，一直在制导着中国过去几十年、现在和将来的发展走向。

◇ 无掩无讳的原生态实录

孙维藩书中所记的部分文革事态不是发生在清华园，而是他到外地串联时的经历。文革初期，即使在学校里持保守观点的学生跑到外地去，往往也会变得很激进，到处煽风点火，鼓吹造反，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他在1966年10月跑到黑龙江的一个边远农场，揪斗著名“大右派”丁玲的一段记录，特别引人注目。深入分析他的这一段经历，对正确解读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重重迷团，有着特别的意义。

孙维藩为什么要到黑龙江边远农场去呢？原来他一个朋友叫杜玉玺，是那边农场学校的教师，文革中被打成了反革命，“被斗了三次”，于是孙维藩“决定立即组织队伍北上为他翻案”。去了以后，又是怎么翻案的呢？首先就是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像丁玲这样的大右派却被农场小汽车接进去，住在招待所，生活安排得很舒适，一天仍是几个菜，过资产阶级寄生生活。他爱人陈明是摘帽右派，每月129元，不干什么活。还请丁玲教夜校，辅导学毛选哩，简直是笑话！”于是他发动群众，“……宝泉岭沸腾了。革命群众拉出了丁玲、冯万钟游了街。汽车队、机关职员、中学红卫兵搞的。也没什么统一组织，但民情很热烈，得到群众好评和拥护。这次游行是宝泉岭第一次，原他们没勇气，问我可以不，我说民愤太大只要群众要求游就游吧。于是他们要把黑五类全游，我说先重点突出找民愤大的冯大鼻子及得到这儿党委保护的丁玲先游，于是就这么干了。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威风。造反派扬眉吐气了，保皇势力害怕了。”

这种通过“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来解救自己人的做法，在文革中十分典型，孙维藩将它照样学来，套用到了丁玲的头上。但是，当时他能如实地记录下来，现在又能无掩无讳地公之于众，这却非常难得。它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文革中受迫害者，或预感到将受到迫害者，为了自保，往往抛出比他自己低一层级的“阶级敌人”，变本加厉地加以迫害。他们是受迫害者，同时也是迫害者，结果导致文革的受迫害层面越扩越大，迫害程度越演越烈，而受迫害最深的还

是那些处于最低层级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以及他们的子女。这个文革中的丛林生态法则，是解读清华大学乃至全国文化大革命迷团的钥匙。

文革初期刘少奇派工作组进入高校，种种作为，后来遭到毛泽东的批判，他自己辩解这是“老革命碰到新问题”，这种说辞已被现今话语界和学术界普遍认可。但是，事实真相当真如此简单吗？文革的斗争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这一点在“五一六通知”上已经确立，刘少奇当然早有准备。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主要是解决刘少奇的问题，这点早有许多端倪可寻。如果说处于当事人一方的刘少奇对此毫无觉察，这也未免太低估刘少奇的政治敏感性了。那末，他采取了什么措施来自保呢？他派出工作组后，立即抛出一大批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作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供给青年学生去批判斗争。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霎时间，清华大学各级党组织被冲垮，几百名大小领导干部被戴高帽、游街、批斗和强迫劳动。这种做法是任何“老革命”历史上从无先例的，总不能说是因循老经验吧？从1966年12月开始，清华有人一直在追问“蒋南翔是被揪出来的还是抛出来的？”其实，这个问题根本用不着问，该认真地问一问的是“蒋南翔是谁抛出来的？为什么要把蒋南翔抛出来？”公平地说，接下去刘少奇决心镇压反工作组的浪潮，进行“反蒯”斗争，将全国几十万学生打成“反革命”，倒真是完全因循1957年反右运动的旧例，不该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使错了，也真是“老革命碰到新问题”。我们这些当年清华文革的亲历者，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后怕：如果刘少奇模式的文化大革命得以继续下去，那末我们这些人不就统统当真成了反革命了？我们这辈子不也是随时可以被人抛出来，被人任意凌辱、宰割的“右派分子”吗？现在社会舆论一致公认，57年反右是知识分子的浩劫。那末，怎么能够仅仅因为刘少奇是文革的主要受害者，就掩饰不谈、甚至对他先是抛出大批干部、接着又迫害无辜学生这样一种已经成了事实的、比57年规模更大的知识分子浩劫持肯定态度呢？

再看1966年8月24日，清华人公认这是清华园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就是在这一天被推毁的。这是简单的“破四旧”吗？事实真相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传到清华，敏感的学生猜测到有所指，几天内贴出大量的反刘少奇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清华红卫兵的几个高干子女，和也是红色后代的中学红卫兵们，为了保护刘少奇和他们的父辈们，策划、秘密串联、调动几十个中学的老红卫兵2000余人到清华园，进行镇压，实行所谓的“红色恐怖”。为了保护“革命领袖”，他们照例要大抓阶级斗争，迫害低层次的“阶级敌人”。他们威迫清华中上层干部推倒二校门，并对正在强迫劳动的“黑帮分子”进行毒打。这个场面十分凄厉恐怖，惨不忍睹，许多目击者现在回忆起来都是心惊肉跳。孙维藩这一天的日记，虽淡淡写了一句“然后红卫兵决定撕掉给中央首长的全部大字报，一会儿便付之一炬”，而他拍下的清华二校门倒塌一刹那，以及让“黑帮”们去清理残渣的残酷场面，却活生生地见证了这段历史。十分清楚，这就是这次红色恐怖行动的真正目的。有文革历史研究者经查证指出，正是这次红色恐怖行动，开创了全国打砸抢暴力行为的先河。

再来看孙维藩8月1日的日记，“从航院传来了一副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当时文革的邪火正在烧向一批革命老干部，为了自保，必须把这股邪火引开。引向谁呢？当然还是引向较低层级的“阶级敌人”以及他们的子女。荒谬的“血统论”顿时蔓延全国，所到之处一片腥风血雨，成千上万的人遭受残酷迫害，家破人亡。不知这幅对联的炮制者们现在有何想法。

许多文革中的被迫害者，为了自保，“转移斗争大方向”，以“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为名，引导群众迫害别人，有时他们自己也亲自参加对他人迫害。从被动的受害者转为主动的施害者的手段，文革中司空见惯，屡见不鲜。而今天，孙维藩通过他如何发动群众批斗丁玲的事实，毫无隐讳地讲了出来。这是需要一点道德勇气的。孙维藩有这个道德勇气，很不容易，因为至今许多人，还没有这份良知，也没有这份勇气。他们在写回忆文革的文章时，往往只是写自己

如何受“四人帮”迫害，却从来不写自己又是如何迫害别人的。他们只控诉别人，从不忏悔自己。许多作家依此基调创作出一批批电影、小说、文艺作品，以至今天的社会上形成了一种脸谱化的文革话语模式，似乎文革中全国各地、各单位突然神秘地冒出一批“四人帮”的爪牙，凶神恶煞，专门整人。这些所谓的文革历史，我们这些亲历者看起来觉得总不大对劲，显然，还历史本来面目还是十分艰巨的事情。

◇ 在荒诞笼罩中的真诚探索

仔细研读孙维藩的文革日记，有心的读者可以梳理出清华文革的主要脉络，并发现：团派和四一四派之间争斗矛盾的主根是文革初期的工作组给种下的。工作组在清华做了两件事，一是抛出蒋南翔，并将清华的70%党政高中层干部打成“修正主义黑帮”；二是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进行“反蒯”，将大批“蒯派”群众打成了反革命。工作组将学生打成反革命的做法，毛泽东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委派周恩来亲自过问，1966年8月4日周恩来主持开大会给“蒯派”平反。而对工作组将广大干部打成黑帮的做法，1967年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清华文革后来分化为团派和四一四两派：团派借毛泽东批判资反路线为动力，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主导思想；四一四则以《红旗》的调查报告为依据，将解放干部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虽然，后来两派的人员组成上互有穿插，四一四中有“蒯派”人物，团派中也有被打成“黑帮”的干部，但两派思想的分野则起源于这两条主根，后来两派的种种争论，甚至残酷的武斗，也基本可以溯源到这两条主根上去。由于工作组是刘少奇派出的，所以，这两条主根其实又可以归为一条总根，都被定性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是毛主席大字报定的性，一是《红旗》文章定的性，都是中央精神，都用来打倒刘少奇。那末，为什么清华两派却会斗得如此激烈，难解难分呢？文化大革命的奥妙就藏在这里面。

按照大多数人的常规想法，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搞掉刘少奇，为自己争夺权力。从这种想法出发，当时的《红旗》杂志的秀才们和四一四的学生娃娃“理论家”们，自作聪明地给毛泽东设计了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收官”招数：批判刘少奇在干部问题上的资反路线，然后顺势解放干部，恢复秩序，从此“河归旧道”。常人看来，这种做法确实是一着好棋。文革初期，刘少奇工作组打倒大批干部，还有高干子女为转移斗争方向而大肆打人整人，都是证据确凿，天怒人怨，打倒刘少奇后借此结束混乱局面，应该说是非常顺理成章。但是，出人预料的是，毛泽东不愿意下“秀才”和“理论家”们给他设计好的棋路，他有自己独特的思路。因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仅仅是要打倒刘少奇，他的宏伟目标是打出一个他理想中的全新的社会来。

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他对自己创建的这个社会的政治、教育、文化体制都是十分地不满意。其实，他比谁都早就看出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体制的根本弊病，他不愿意再朝这条路走下去。他对自己期许的使命是创建一个圣朝的社会体制来。现存的社会体制就像他自己双手捏造出来的一只碗，但那是仿照别人的坯子做成的，现在端起来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他存心将它全部打碎，重新团成泥巴，再捏它一个。做成一个什么新式样的碗呢？这是深埋在他头脑深处的一个美不可言的理想世界，时而清晰，时而飘渺。这个理想世界的成分十分庞杂，有他少年时期信奉过的无政府主义，而后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张鲁的五斗米教，秦始皇的封建制、农民造反的均贫富、西方的乌托邦、东方的大同世界，他也不完全排除民主自由，巴黎公社式的选举之类也在其中，当然最念念不忘的是他自己施行过的“三钱油、三钱盐、一斤半面”式的战时共产主义。这个理想模式具体是什么样子，他自己心里也飘忽不定，只能常常用只言片语来描摹一二。但这个理想世界的诱惑实在太太，他三番五次地公开向全国全党号召，不惜一切代

价向这个伟大理想发起冲击。解放后搞的一系列运动，合作化、双百方针，大跃进、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教育革命，反修防修，都是为了这个理想，无奈屡试屡败。

他深感老的一批文臣武将理解不了他的这番宏图，不得力，不肯出力，做官当老爷，没有革命精神了，成了他实现这宏图的巨大阻力。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他决心让青年学生“革命小将”打头阵，把一切旧体制砸烂打乱，建设一个他在“五七指示”中粗线条描绘的史无前例的新体制。所以，他宁愿容忍蒯大富团派的“大翻个”理论，放任他们先胡打乱闹地折腾一阵试试。而四一四这种没出息孩子的模样，说来说去，无非让他回到老路子去，这是他老人家最不喜见的。打倒一批干部，那是小意思，让他们多挨挨整怕什么，以后选些得力的人再上来就好了。武斗死人，甚至内战，在毛泽东看来也根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指挥过双方投入几百万军队的大战，几十万几十万地死人，结果天下打下来了。今天为了那个宏伟的理想社会目标，再死个几千、几万人，不值得大惊小怪。几个秀才“理论家”要给毛主席支招，实在是有点自不量力了。你们的那点小伎俩，哪能放在毛泽东的眼里！把文革初期搞乱的责任全推到刘少奇一个人头上，他老人家根本不屑玩这种小招术，因为这么一来，不仅会坐实了外界关于文革就是打倒政治对手的谣言，而且文革“斗批改”新事物都没弄出个名堂就匆匆收兵，就是承认自己对理想社会冲击的又一次失败。所以，毛泽东竭力反对刘少奇工作组在学生问题上的资反路线来鼓动文革，却不情愿因反对刘在干部问题上的资反路线来过早地结束文革。四一四思潮的理论总是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前面我们问过“蒋南翔是谁抛出来的？为什么要把蒋南翔抛出来？”很难想象，刘少奇抛出蒋南翔时，毛泽东完全不知情，很可能是他们通过气，双方同意才抛出来的。其实他们心里谁都不会真正认为蒋南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因为完全没有什么可信的事实根据。为什么还要将他抛出来呢？他们两个人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对刘少奇来说，这是政治策略，为了自保，为了引开祸水。除此外，很难作别的解释，因为在刘的思想体系中，找不出蒋南翔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而对毛泽东来说，这是政治理想，是为了教育革命。因为按毛的理想，蒋南翔的一套教育方法简直是完全不合他的心意。他和刘两人虽然动机不一，先搞乱了再说，却是不谋而合。这里我不是说，毛泽东的动机，就一定比刘少奇的动机要高尚多少。无论什么动机，整了这么多的人，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了这么大的苦难，都只能说是历史的犯罪。

毛泽东是一位权谋家，也是理想家。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权谋和理想相结合的产物。有必要指出，搞权谋不一定卑鄙，有理想也不一定就崇高，它们各自都可能造福人民，也可能祸害社会。关键是，一旦失去人性和人权的道德底线的约束，将权谋和理想两者结合起来，却会对人类文明形成最大的破坏力。我认为，这一点，是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推崇理想主义的品格，只要为了理想，似乎一切不择手段的行为都可得到容忍和原谅。文革中许多骇人听闻的恶行，都是在理想主义的掩护下进行的。自以为真诚的理想，为行恶者解除了心理障碍，使恶行更加肆无忌惮。大家都记得，文革初期，任何丑恶的行径，只要冠上革命的名义，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畅通无阻。文革中有不少热血青年就是被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所吸引，钻进“四人帮”的“理论”怪圈中去的。清华有一些很有天分的同学做出一些显然违反常理的举动来，其原因也在这里。纵观世界历史，理想主义侵害人类文明的例证屡见不鲜。今天，我们再也不应该盲目崇尚理想主义了，但是，也不能就此摒弃理想主义。只有那些在总结历史教训中，找到并把握理想主义的现实基础和道德基线，还能坚持远大理想的人们，才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中坚。

毛泽东的理想社会是虚渺的和荒诞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有必要指出，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地，包括清华大学，确实有一批人在真诚地、勇敢地探索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中国知识分子良心没有变。这一代清华学生，仍然是全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们的政治责任感和正义感，同“五四”和“一二·九”时的

清华学生是一脉相承的。这一代年轻学生从小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思想正统教育，开始思想确实比较封闭，容易上当受骗。政治运动的残酷和险恶，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快清醒。而文革初期提倡的大民主和造反精神，对他们来说，反而成为一个思想解放运动。思想空前活跃，班系的界限打开，自由组合成许多“战斗组”，有些战斗组其实等于读书会。马列原著、鲁迅作品、西方经典哲学、政论和文学名著，一些供高级干部参阅的内部书刊，甚至秘密文件（如赫鲁晓夫二十大报告，彭德怀万言书之类）从各种渠道流到学生手中，大家一边传阅，一边讨论。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融汇一起，思想互相碰撞，学会了独立思考，迅速成熟起来。

他们中有的人在主观上虽尚不自觉，客观事实上在群众中组织起一股抵制文化大革命极左做法的力量；有的人退出运动，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中进行冷静的观察。他们在反思文革和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中，看到了十七年旧体制的诸多弊病。他们反对“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套极左路线，也不愿意退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旧体制去。当时，他们中的少数人已经朦胧地感觉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应该补资本主义的课，应该走一条更为务实的道路。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我是亲身经历的。现在的人或许不相信，下面我引周泉缨1967年10月24日大字报上的几句话来作证明：“逍遥派中一些人是一直在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古今中外的一些文件书籍的。他们在这里下的功夫很大。他们不仅这样深入细致地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而且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我是很尊重他们的。他们是小人物，似乎是默默无闻的，对小人物不要蔑视……”

打倒“四人帮”后，清华大学一批文革时期经受了考验的运动积极分子，以及一些默默无闻的“逍遥派”学生，坚决拥护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许多人成了“改革开放”的骨干和领头人。文革时期在校的几届清华大学毕业生，文革后在中国各级党、政、经、学各界担任要职的人数，比任何别的时期都要多。这绝不是偶然的。这几届清华学生对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目前我国国家和清华大学本身的现任一把手，都是这几届清华毕业生，这就很说明问题。

当然，这几届清华学生对中国社会的贡献，远远不能单用多少人在体制内做了大官来衡量。文革中默默无闻、探索中国前途的小人物，有些在文革后做了大官，有些现在还是小人物，有人甚至为此受了不少挫折，遭到不公正的待遇。现在，他们中不少人还在无怨无悔地探索着，这些人是这几届清华学生中最可敬的英雄。公正地评价文革中几届清华学生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清华大学校史工作应尽的职责。但是，清华大学校庆90周年，有关方面总结清华大学历史时，对清华在文革这几年的发生的事情讳莫如深，寥寥几笔带过，似乎这几届学生在学校中做的事都是见不得人的，实际上是无视，甚至抹杀了清华这几年对社会的重要贡献。这样的认识和态度，实在是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

◇ 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文化大革命后，研究文革一直是中外学术界的重要课题。应该说，前些年中国人民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是卓有成效的。通过批判文革极左思潮，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取得空前的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和世界公认的事实。但是，也应该看到，多年以来我国对文革的研究一直采取“淡化处理、全面否定”的态度，对文革的批判普遍存在着标签化、漫画化的现象。至今，有些事实的真相还没有完全揭秘，有些事件的过程还没有梳理清楚，有些思想、文化层面上的经验教训还没有认真总结。现在社会上甚至出现一些“极端逆反”的文革后遗症现象。比如，文革提出“反对干部特殊化”，现在领导干部的贪污腐化愈演愈烈，腐败已经到了事关党和政府生死存亡的关头；文革中提倡“道德新风尚”，现在全国存在着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为金钱可以不顾廉耻、不择手段，社会道德风气已经快要守不住最后的底线；文革中提倡“为理想献身”，现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普遍流行犬儒主

义，只关心自己的升官发财，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文革时，我们国家走了一个极端，现在反其道而用之，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这不是一个成熟社会的正常现象。更加深入地研究文革，对克服这些文革后遗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同时，在思想、文化的层面研究文革，对确定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也具有深远的意义。现在有人呼吁中国进行政治改革，提倡西方的民主政体。我个人十分赞赏民主政治，但是也隐隐地担忧：民主政体这个好东西，搬到我们这个国度里来会不会变质？文化革命时在清华园，我们搞过“无产阶级大民主”，试行过“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团派和四一四在一定程度上也相当于两党制。结果怎么样呢？大民主成了无政府的大混乱，自由选举成了“揭老底战斗队”的“大家臭臭臭”，“两大派”最后演变成刀枪相见的血腥武斗。美国的民主政治建立在欧洲启蒙运动的基础上，它提倡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尊重自己的人格，也尊重别人的人格，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负责。来看看我们的国民性：文革中的造反英雄没有真正的独立思想，往往是猜测中央动态的押宝投机，而只要以革命的名义就可以不择手段，为了避免自己受迫害就可以牺牲别人、变本加厉地迫害他人。文革后，很少有人深刻反省自己的行为，人们往往只控诉自己如何受迫害，不忏悔自己怎么去迫害别人，把一切责任都往“四人帮”的筐里装，把自己所作所为统统归为上当受骗，振振有辞地说是“人所共知的违心行为”。这样的国民性如果不反省、不改变，谁敢保证在中国搞自由选举和两党制而不会重蹈文革的覆辙呢！

在美国，我深深地感到，尽管文化革命已经过去多年，它始终是一个淡化不了、回避不过的话题。我有一位业务很平庸的台湾同事，当听到文革期间我正在北京读书时，脸上不禁显露出一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因为在他的印象中，北京的红卫兵不是抡着皮带打人，就是围着圈跳忠字舞，都是些道德和智力有问题的人。还有一次，我所在高中的老师进行业务学习时，辅导老师拿出一叠写有“红卫兵”、“四人帮”等字样的卡片来向教师们示范怎么教中学生掌握名词概念。当然，美国也有一些很严肃的学术机构在专门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女儿在耶鲁大学读书时，她们的一位名教授开了一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课程，去修这门课的学生十分踊跃。还有我听说过，一位正在攻读历史专业博士生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清华大学文革井冈山红卫兵两大派分裂的原因分析”。这些教授和专家有研究历史的专业方法，但他们没有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所能收集到的资料也只能是已见诸文字的史料，从文字到文字，难免会有些片面和失真的地方。我们是文化革命的亲历者，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过去的行为都已成了众人评论和研究对象。与其让旁人或后人来猜测我们、研究我们，我们何不自己站出来反省自己，解剖自己。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把自己的心路告诉后代，向历史作一个交代。

有人说，真正认识和评价文化大革命现在还太早，重大历史事件需要时间的距离感，才能看得明白。我认为，这种说法或许有理，但历史可以等待，我们却不能等待。我们亲身经历和见证文革的这一代人，老之将至，许多人已经退休，有些人甚至逐渐失去了追忆往事的能力。许多事件的具体情景，尤其是我们当时的思路和心态，如果再不抓紧记录下来，就可能永远湮没，永不会被后人所知。从目前反思文革的情况看，中学红卫兵写的回忆文章较多，大学红卫兵的回忆还不太多，清华大学文革亲历者的回忆就更少了。我看到有位文革研究者在他的文章中说：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出尽风头，但在反思文革、否定文革的行动中却乏善可陈。这个评论无论是否中肯，对我们都是一个警策。

我们这几届清华学生是不幸的，政治运动虚耗了我们最宝贵的青春和才华。我们这几届清华学生也是幸运的，我们近距离地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宏大、最荒诞、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场政治运动。但我们没有消沉，在相当长的一段艰苦生活中，在冷静的反思中寻找中国的出路。文革后，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事业有成，有的人还官居高位，退休后不少人已经含饴弄孙，安享晚年了。文革运动搞得天下大乱，害了这么多人，死了这么多人。我们的一些同学就在清华大学的百日武斗中失去了生命。每想起他们，我们心中都会产生出一种锥心的伤痛。为了死去的

他们，为了未来的后代，我们应该利用渐逝的老暮之年，把我们当年那段亲身经历说出来。只要我们说的是真实的，就会有价值。只有我们说的是真实的，才会有价值。真实的东西，只有我们将它们说出来，才会有价值。当时你属于什么派，是保守还是造反，是老团还是老四，并不重要。史识可以不同，史实只有一个。真实与否，不能任人雕刻；正确与否，听凭后人评说。真实比正确更重要。为历史，为后代留下真实的记录，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后责任。

2007年12月于纽约

□ 原载《记忆》2009年12期

~~~~~

# 【书刊评论】

## 一代青年精英的文革思想史 ——读印红标著《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

· 何 蜀 ·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曾经爆发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大陆，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论著却非常难于问世，而其中研究那一代青年的思想状况、青年思想者“足迹”的论著就更是少得可怜，几乎可以说是一片荒芜。因此，这部著作的问世，不能不让人感到由衷的喜悦。

作者的学术勇气首先就令人钦佩。文革研究，在中国大陆本来就是一个很难进行、也很难见到收获的“禁区”，而要闯入这个“禁区”中研究青年的思想、思潮，又比研究文革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国民经济以至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历史状况等等，更加虚空抽象，更加缺乏现成资料，也更少先例，除了极个别人（如宋永毅对“异端思潮”的研究，徐友渔对红卫兵不同派别思潮的研究，杨健对文革“地下文学”和“知青文学”中一些文艺思潮的研究）在这方面作过探索外，作者几乎是要在蛮荒之地上开辟出一条路来。

作者的努力没有白费。这部书对文革时期青年思潮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对文革十年期间曾经先后活跃在老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及其他青年群体中的一些或显（如联动思潮、极左派思潮、“新阶级”思潮、李一哲大字报代表的思潮、四五运动前后的各种思潮等）或隐（当时并未公开发表或遭到批判从而没有得到传播造成影响）的重要思潮个案，本书都尽可能地搜寻、荟集起来，作了客观的记叙与冷静的评说。在写作中，作者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钻故纸堆，寻找当事人或见证人、知情人，进行考察、采访，查阅和辨析、筛选、整理资料，沉溺其中前后近十年，个中艰辛，是一般人很难体会到的。

作者谦虚地称“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梳理是本书的重点”，本书在这方面也确实给人蔚为大观之感，书中对文革不同时期的重要青年思潮，作了分门别类的发掘和梳理，资料之丰富，涉猎之广泛，堪称一部文革十年青年精英政治思潮的“小百科”，正如徐友渔所说，本书已经成为“文革研究、青年研究、当代思想研究的必读书”。

本书的注释也很值得注意。注释不仅多，而且内容丰富，信息量大，不只有对书中引文出处的注释，而且还有对采访情况的说明，对历史资料的考订（如50页至52页注65、66、67中对《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即“003通告”的详细考订），对同一资料不同文本的校勘，对有关人物的简历介绍等等，大大增强了本书“小百科”的分量。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把《“571 工程”纪要》作为“与一般青年立场迥异的另类政治思想资料”，在第五章第五节用两个小节的篇幅作了专门的、持论平和的研究。作者分析了《纪要》内容三点引人注目之处：第一，对党内最高层斗争局势的评估和对策；第二，对毛泽东的猛烈攻击；第三，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政治和政策弊端的激烈抨击。（349—351 页）指出：《纪要》“如此胆大妄为地策划推翻以至谋害毛泽东及张春桥等文革势力的武装政变，如此毫无顾忌地谴责毛泽东政治人格和党内斗争作为，如此无情地揭露和批判文革以来的政策弊端，在中共党内恐怕是没有先例的，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这样的言论竟出自‘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文化大革命的‘副统帅’、党章载明的毛泽东接班人林彪的儿子之手。”“仅就揭露文革以来的政治和社会弊端而言，《纪要》敏锐地抓住了当时的政策困境和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怨恨之处，其尖锐和全面程度，在当时的中国是仅见的，即使在同期的青年叛逆性思潮当中，能见诸文字的言论亦无出其右，其中很多揭露可谓切中时弊。”“然而，问题的复杂之处是，林立果及其《纪要》不是一般青年的单纯政论，而是与林彪以及林彪集团密不可分。因而，不论当时人们的判断，还是后来人的评价，都不能仅着眼于《纪要》的文本。”（352—353 页）作者还客观分析了这个《纪要》与林彪的关系，认为“林彪的真实面目至今是一个谜……林彪与这个《纪要》的关系至今不明，很难说它是林彪集团认可的纲领。”（348 页）并提出：“林彪事件有太多的谜团。林立果（及其小‘舰队’）、林彪和林彪派系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纪要》是林彪的政治纲领，还是林立果几个人的主张？如果《纪要》只是林立果的观点，那么他与林彪集团多年的作为摆脱得了关系吗？如果《纪要》反映了林彪的主张，那么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林彪的观点？这些观点可能被以林彪为首的一班高级领导人接受吗？”“其政策批判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共产党的事业、领导干部的利益和人民的疾苦，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发动政变的策略、‘动员群众’实现其集团利益的口号？如果相信号召人民打倒‘当代秦始皇 B—52’的林立果，那么将如何处置那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林彪？……在诸如此类的诸多疑团化解之前，《纪要》难于赢得人们的信任和拥护。不用说当时很多中国人还没有摆脱林彪曾经卖力营造的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思想束缚，即使对毛泽东有所怀疑、批评的人，也很难在政治上相信林立果，或者不能接受政变和谋杀毛泽东的做法。”“谁能保证林彪等人为了争取党心民心，一旦当权，就会革除弊端，实现政治清明呢？反倒是《纪要》对江田岛精神的崇尚及林彪等人肆无忌惮的家族特权，令人不能不忧虑法西斯军人独裁的阴魂。”（354 页）

这一部分论述能够力避陈说，难能可贵。只是以《“571 工程”纪要》是“林彪之子林立果为首的小集团草拟的政变计划要点”（348 页）为论述前提，尚可商榷。因至今为止仍然缺乏足够的实证材料来证实官方的这方面指控。在这方面仍然如整个林彪事件一样有“太多的谜团”。目前对《“571 工程”纪要》的文本真实性及其被发现的经过等尚存许多疑问，更难判定其作者到底是谁，在本书分析的《纪要》三点引人注目之处中，第一点表现出《纪要》作者对党内高层斗争有较多了解，而第三点则表现出对下层的民间疾苦及被压抑的普遍民怨有较深切的体会——而这方面内容，似很难与长期生活于特权地位中的林立果相联系。

另一处引起笔者注意的是第七章“四五运动时期的青年思潮”中的第三节“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探索”，作者在这一节里专门用两个小节分别介绍了胡平和陈子明在文革中、后期的思想探索，并指出：“尽管尚未见到这两个思想倾向的原始文本，但是依据回忆资料，可以说这个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新动向是在朝着 1957 年甚至 1949 年以前中国的自由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主义复归。”（491 页）而这是在以往的一些相关论著中没有专门论及的。可谓填补了一个空白。

这样一部大著作，自然难免会有不足之处。在本书的上、下两编中，上编写文革前三年（作者称之为“红卫兵运动时期”），下编写“上山下乡和四五运动期间”，比较起来，上编有一个较明显的不足：主要着眼于北京地区的情况，甚至在讲到保守派红卫兵思潮（第一章第二节）时，也没有以其他省区更典型的例子作为研究对象。讲造反派红卫兵思潮（第二章第一节），也基本

上不提其他省区的情况。只有第二章第二节讲“极左‘新思潮’”时才提到了湖南“省无联”、武汉“北决扬”等几个名气很大的典型案例。读上编，时时会有这样一个感觉，似乎作者只是在写北京地区的青年思潮而非全国的青年思潮。下编在这方面就好得多，不仅时间跨度更大，而且读后总的感觉比上编内容更充实，视野更开阔，新材料更多，涉及面更广。

除此之外，本书最大的缺陷，笔者认为只是论及了青年精英的思潮，而未论及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青年大众的思潮。而在青年精英中，又主要是论及了学生青年的思潮，而较少涉及其他青年群体的思潮（已经涉及到一些，如青年工人遇罗克、史云峰，复员军人石仁祥，青年农民权佳果等，但与学生青年相比分量显然相去太远）。在本书的书名及上、下两编标题中就可以看出这一定位的局限。书名《失踪者的足迹》，显然着眼点是在那些足以载入思想史史册、作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精英方面，而忽略了青年大众的广泛的、世俗的思潮。书的上编是“红卫兵运动时期的青年思潮”，下编是“上山下乡到四五运动期间的青年思潮”。以这样两个标题来概括文革十年的“青年思潮”，显然不够。上编中说“在此阶段，青年思想活动的存在方式主要是红卫兵运动。”（2页）这样的说法就太片面。文革前三年“青年思想活动的存在方式”不能简单地说是“主要是红卫兵运动”，红卫兵只是对青年学生中群众组织的一种泛指（并非所有学生都参加了红卫兵，也并非所有的学生组织都是红卫兵组织，即使是造反派学生也有些并未参加红卫兵，这是常常被人们忽略的），而在文革前三年的群众运动中，工人、农民、商业职工、文艺团体演职人员、学校教职工、卫生系统医护人员及职工、党政机关干部，甚至军区机关、军队文体单位人员中，最先起来造反的和一直在造反中起主导作用的，大多是青年。后来毛泽东提出的“老中青三结合”，所谓“青”，实际上就是指造反派代表，而并非单指学生甚至主要不是指学生，看一看各省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看一看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即可知道，那些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大多是二十来岁的青年。因此，讲青年思潮只讲学生青年甚至只讲红卫兵的思潮，显然是不够的。而在下编所涉及的1968至1976年间，以“上山下乡到四五运动”来概括，也显得偏重于学生青年，1968年后除了学生青年上山下乡外，城市里仍然有大批青年在从事各行业工作。并不等于全国青年都上山下乡了。若把“上山下乡”作为划分一个时段的标志性事件，倒不如使用同一时期的“群众组织解散”或“全国山河一片红”等来代替更全面一些。

另一方面，本书所论及的青年思潮，实际上只是青年精英中的政治思潮——而且只限于时政和政策批判、社会和制度批判等方面的思潮，而忽略了另一些曾在许多地区掀起过大波澜、影响过大批青年的思潮，比如一度弥漫全国各地的“揪军内一小撮”思潮，“揪叛徒”思潮，比如上海炮打张春桥、山西打倒“刘（贯一）、陈（守忠）、刘（志兰）”、四川打倒“刘（结挺）、张（西挺）”、黑龙江炮打潘复生、贵州炮打李再含等炮打“新生红色政权”中个别领导人的思潮，还有热衷于暴力和武斗、动辄“血战到底”的思潮等，除政治思潮外，本书很少或基本上未涉及青年大众的其他更广泛、更普遍、更世俗的（如文艺爱好、婚恋恋爱、时尚追求等等）思潮。而恰恰在这些方面的思潮更能反映出一些社会历史阶段群体性、本质性的东西。比如，在狂热的“路线斗争”高潮中，许多青年却消极对待“革命大批判”，宁可当“逍遥派”，埋头于“线路斗争”，大搞个人的“三线（毛线、塑料编织线、半导体收音机漆包线）建设”；又比如，在文革中后期，即中共各级新政权革命委员会、新党委建立起来，“无产阶级专政”得到空前加强，“最革命”的舆论甚嚣尘上，“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叫得震天响的时候，许多地方的青年大众婚恋择偶标准却悄悄流行开了以“三转一响”（“三转”指三样能“转”的东西——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一响”指收音机）为时尚追求。在这种世俗思潮的冲击下，多年的“继续革命”宣传教育灌输的成果简直是不堪一击。这不是很值得研究的现象吗？列宁也不得不慨叹“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对青年中这类世俗思潮的研究，理应成为“青年思潮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

本书最后一章第八章“青年思潮的主要流派”的最后一节“主要流派与中共党内斗争的关

系”，颇为引人注目，因为文革中只要是被当作“反革命”案清查的青年思潮个案，当局均不相信那些青年能自己写出那样的文章或发表那样的言论，总是要追查案件背后“长胡子”的“黑手”（而当局在宣传革命领袖人物时又总是说他们如何在很年青的时候就独立写成了不朽的雄文或发表了杰出的宏论）。可惜书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具体论述却不多。实际上，当时许多青年思潮并无高层背景。但要从思想根源上探寻其相关联系，还是有文章可做的。

读到本书结尾部分的这些话，笔者深为感慨：“文革期间青年的思想探索是艰险的，甚至是带血的历程，它使我们倍加重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必须建立和健全民主和法治，保障人民思想探讨和言论的权利。”“他们的探索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启迪和激励人们摆脱专制愚昧，创造美好的未来。”（553—554页）今天的文革研究不是同样面临着虽不“带血”却依然艰险的现实吗？此书的写作与出版不是也在与当年的“失踪者”们一样继续着不懈的探索吗？

《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 原载《记忆》2009年15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             |          |
|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             |          |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             |          |

---